

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沿革

夏 佳, 王 斌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 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但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译者这一主体却总是被忽略。在阐释学理论的视角下, 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基于此, 以阐释学主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斯坦纳的主要思想为理论发展脉络, 分析阐释学框架下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解读。研究发现: 施莱尔马赫首先看到译者的主体作用, 伽达默尔和斯坦纳则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描绘了译者的能动性。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 施莱尔马赫; 伽达默尔; 斯坦纳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895X(2024)02 - 0124 - 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0128044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 Theory

XIA Jia, WANG B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translator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 theory proposed by Schleiermacher, Gadamer and Steiner,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is expounded and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Schleiermacher is the first scholar who notice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hich is described by Gadamer and Steiner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 respectively.

Keyword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hermeneutics; Schleiermacher; Gadamer; Steiner

人类语言各不相通, 翻译为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 而究其翻译本身,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翻译的界定标准、主体等也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但是, 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大使”——译者, 一直以来却处于“隐身”状态。人们并不看重这个译文文字输出者的地位和身份, 总是以“原文本”为绝对权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文化转向运动后,

译者等其他因素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将译者纳入翻译研究之后, 翻译开辟了新视野, 许多翻译现象变得开阔明朗, 不再处于混沌纠缠的迷雾之中。自此, 翻译理论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 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 探讨影响整个过程的操控因素^[1]。

收稿日期: 2022 - 01 - 28

作者简介: 夏 佳,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认知翻译学。E-mail: 1024015480@qq.com

通信作者: 王 斌, 男, 教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翻译学。E-mail: ussteng@sina.com

阐释运动的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浪漫派诗人。阐释学本身并不是为翻译而生,而是指向艺术作品的理解与鉴赏。当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时,人们都从自己的视角“理解阐释”它,在自己的心中刻画出作品附着的涵义,翻译过程也同样如此。对于作者的思想呈现,译者需要解读进而进行解释,这与艺术作品的欣赏阐释是完全相通的,所以阐释学对于翻译现象的解释也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从阐释学奠基者施莱尔马赫开始,阐释学走进人们的视野,海德格尔及其学生伽达默尔也为阐释学发展贡献了力量,但是直到斯坦纳的《通天塔之后》问世后,阐释学的影响才逐渐扩大。译者作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主体,主体性究竟是如何体现和发挥的,阐释学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本文以阐释学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为脉络,不再只关注单个孤立侧面,而以一个理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读阐释学中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并以具体实例辅证阐释观视角下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一、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中,原文作者、原文产生的社会环境、译者、译文产出的接受环境、读者以及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制约等许多因素都是翻译这张复杂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在文化转向运动前,译者的地位一直不甚明朗,处于依附地位。在文化转向运动后,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角色终于被人们看见,由此,也更好地解释了一些翻译现象。译者进行翻译时,是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在进行活动,势必会将自己的主体性显现出来。那么如何看待除了译者主体之外的其他因素呢?范畴观可以给予解答。从范畴观来看,译者是翻译这项活动的中心主体,原作者和读者以及文化制约外部环境等则是影响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译学词典》对于译者主体性给出的定义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征。”^[2]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时,在边缘主体的影响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会表现出主观能动性,去进行原文本的改造与创造。这种主观能动性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可以发现,当把译者主体性纳入来观测翻译时,整个翻译过程就变得动态开放起来。

二、阐释学

(一)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

作为“现代解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将阐释学变为了一项独立哲学,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论,对翻译也形成了一定影响。首先,施莱尔马赫认为阐释学是为了避免误解,哪里有误解,哪里就需要阐释学。而且他认为误解是普遍的、必然的、自动的。这是由于译者在阐释文本时,碍于时间空间、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知识的因素,总是会有产生误解的可能性。施莱尔马赫看到了翻译过程中制约译者的成分,也间接承认了译者主体的地位。正是因为译者处于翻译中的中心一环,有着主体性作用的存在,才会出现误解的情况。而且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误解不仅仅发生在翻译中,还发生在母语和日常生活中^[4]。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将解释的范围从文本方面扩大到了日常生活交际中。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的眼界是十分宽广的,他看到了人这一主体在生活交际中的中心网络作用。理解总是带有自我的个性烙印,不论是在同族语言所持者之间交流还是跨文化语言交流,也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交流,传递方与接受方之间因为主体性的存在,总是没有办法“心心相印”,误解总是会产生。

例1 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
(《红楼梦》第一回)

杨宪益、戴乃迭译 Outside this Changmen Gate was a certain *Ten-li Street*, off which ran the Lane of *Humanity and Purity*.

霍克斯译 Outside the Chang-men Gate is a wide thoroughfare called *Worldly Way*; and somewhere off *Worldly Way* is an area called *Carnal Lane*.

《红楼梦》的一个很大特征是作者总是巧妙运用中文的谐音与隐喻将暗语蕴藏其中。句中的“十里街”(势利街)与“仁清巷”(人情巷),均有着谐音背后的寓意。但是在“仁清巷”的翻译上,杨戴夫妇的译文却完全误解了原文的真正含义,认为是表面字义的“仁义”与“清明”,与在“势利街”中交缠混杂着复杂的人情世故的真实意义产生了巨大偏差,所以杨先生的误读给读者传递了错误信息。

为了避免误解,施莱尔马赫提出译者需要对原文本进行精确的理解。他认为阐释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而理解不仅仅是对信息的解码,还包括了语言分析和移情^[5]。达到精确的理解需要对原文进行主观和客观的重构。客观重构是指译者需要达

到与原文作者一样的知识水平,得以拥有语言上的重构;主观重构是指译者要能够完全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观念以及他所表达的旨意。进行重构时再融合语法阐释和心理阐释,关注文化中的特征与原作者的个性。通过这些方法,施莱尔马赫认为可以逐步化解误解。同时,他始终坚持,误解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绝对的理解是人达不到的,但是避免误解的要求是应当的^[6]。施莱尔马赫看到了导致误解的原因,意识到了译者的能动创造性与译者本身的个体特殊性。但是,他一直强调也追求通过克服误解来达到重构作者意图的目标。实际上,这是很难实现的。而且施莱尔马赫倾向于让读者适应作者的洋化翻译策略,让作者尽量保持平静,仍然受到了当时“原作中心”思潮的影响。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只看到了译者主体状态的一部分,还不知其全貌与力量之强大,试图矫正其个体历史性,避免误解,更注重语言的客观性阐释^[7]。

(二)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

作为同样对于阐释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海德格爾的学生,伽达默尔在海德格爾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体系。他认为,文本只是一个半封闭的产品和理解过程的一个阶段^[8]。伽达默尔持开放动态观点,认为译者一定会将自己的视域带入翻译活动中,否则翻译是不可能成立的。而自己的视域中,必然带有主观的“偏见”。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每个人却成长于不同的环境背景,脑海中承载的想法各自纷飞构筑了只属于个人自我的主观世界。在海德格爾的基础上,伽达默尔称之为“前见”或“偏见”,即译者在翻译阐释文本前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世界上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前见,前见具有完全独特的个人色彩。所以进行文本阐释时,译者不会完全客观,因为前见是无法割裂的。但是,伽达默尔并不认为“偏见”一定会成为翻译的绊脚石,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着积极或者消极的意义。

前见就是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译者自己的视域。在翻译时,译者自己的视域会与原文本视域进行融合阐释,形成一个新的视域,而这个新视域则再与目的语文化这个视域进行第二次融合最终形成译文,整个视域发展都是动态开放的。所以在伽达默尔看来,翻译时译者经历了十分复杂多变的视域融合,在这其中译者需要反复考量、揣摩、选择。这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恰恰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因此也就允许了多种译本的存在,甚至出现同

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也会呈交出不同译文的情况。视域融合的动态性与译者个体的个性历史性决定了这一点。

例2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Burton Watson 译 Behind me I do not see the ancient men,

Before me I do not see the ones to come.

许渊冲译 Where are the sages of the past,

And those of future years?

诗人陈子昂怀才不遇,因此登上蓟北楼,写下了《登幽州台歌》等诗篇。诗中倾泻出慷慨悲凉之意,令读者深深感受到诗人失意的境遇。所以,文中的古人和来者,实际上指的是贤明的君主。两位译者的不同译文显示出了主体差异性^[9],而这与前见有着密切关联。华兹生(Watson)在进行翻译时没有解读出“开明的君主”这一含义。因为华兹生是外国译者,对于陈子昂当时所处的年代与际遇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或者并没有联想至文字背后意指的个人志向抒发。实际上,中国古代文人喜爱通过写诗的方式谱写自己政途的失意。尽管华兹生是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方面有着很大成就,但可能他的“前见”里并没有这样的体认知识,因此在第一次与原文本进行视域融合时,他并不能完全理解作者的原意与情感所在,也就影响了对此语准确意义的解读。而许渊冲一直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对于诗人及诗中情感的把握是极佳的,再加上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所以其“前见”是很丰富全面的,在视域融合时,也较好地领悟了作者的原意。

例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静夜思》)

许渊冲译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 I'm drowned.

杨宪益、戴乃迭译 I lift my eyes and see the moon,

I bend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

W. J. B. Fletcher 译 On he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

《静夜思》一诗在人们的解读中,一直被认为是在抒发思乡之愁,所以诗中洋溢的情感是以悲伤为基调的。许渊冲与杨戴夫妇的翻译“homesick”“think of home”均是以忧愁思乡为情感导向,而

Fletcher 却跳出了悲伤的情感。在他的解读下,诗中“思故乡”并不是在感怀无法回到家乡的惆怅思绪,而是在回想家乡的甜蜜快乐时光,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忧伤氛围。作为外国译者,Fletcher 的前见与中国本国译者肯定大不相同,由此也可以理解对于“思故乡”解读的大相径庭。

例4 An episode of humor or kindness touches and amuses him here and there — a pretty child looking at a gingerbread stall. (*The Vanity Fair*)

杨必译 这儿有一个漂亮的孩子,眼巴巴的瞧着卖姜汁面包的摊儿。

贾文浩、贾文渊译 一个孩子贪婪地望着姜摊饼。

李明译 一个漂亮的小孩儿直盯着姜摊饼儿。

原文描述了一个孩子站在姜饼摊前的场景,相较于前面的例子,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撇去了文化背景的成分,是两种文化相通且没有理解障碍的情景表达,但是三位译者最终形成的译文都运用了不一样的表述。杨必的译文表现出了儿童的天真可怜的神态,令读者读罢产生同情之心。贾文浩和贾文渊的译文则将儿童内心对于姜饼的极度渴望表现了出来。李明的翻译侧重在动作的延续上,侧面表现儿童想要吃姜饼的心情。

“前见”会干预译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影响第一次视域融合,而在第二次融合中,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存在,不同译者对于遣词造句会有自己的衡量与选择,对于情景的描写也有自己侧重刻画的部分。因此,视域融合后的结果往往大不相同,会产生多种解读,多个译本。

伽达默尔也看到了造成“偏见”的译者因素,但并没有像施莱尔马赫一样试图掩盖和化解它,而是尝试解读译者阐释的过程,更加开放地看待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伽达默尔认为原作文本本身也是一个“半封闭的成品”,有许多未定点和模糊点,作品的意义是不断流动生成的过程,离不开观者的参与。所以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一旦脱离作者笔端,就变成了一个客体。译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完全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文本客体的主观解读,解读的意义是动态的,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解读。所以,在例3 Fletcher 的译文中,呈现出的解读也为《静夜思》的意义提供了不同的切面,让读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致。相较于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不以追求作者意图为目标,而是让读者在阐释中表达自我^[7]。他洞察到了译者主体性是不可磨灭的,所以给予译者主体性充分的肯定,并关注原文、译者与译文间的交互对话。

因此,视域融合注定是一个复杂多变不断打磨的过程,也就允许和接纳了多种译文的存在。

(三) 斯坦纳的阐释学

斯坦纳所著《通天塔之后》成为了影响深远的作品,也是当代翻译阐释学的关键性文献。斯坦纳认为,阐释学是“考察”“理解”文本的意义,并试图以意义的普遍模式解释这一过程。为此,在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阐释运动四步骤:信任、进攻、容纳和补偿。信任是指译者相信原文中的内容可以被理解阐释。谈到进攻,斯坦纳认为理解是“挪用”且“暴力”的^[10]。这一步骤永远都是有偏见的,是对原作者意图和视域无法避免的攻击。这可以看作是伽达默尔提出的第一次视域融合过程,译者带着自己的“偏见”进攻原文,解读并获取意义。而在目的性翻译时,译者会对原文进行轰炸式攫取。晚清时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挽救危亡的国家,想要从思想上开化民众,实现政治改革,便在译介国外著作时,大量融入自我的政治思想,对原文进行有意识的进攻,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当然,这是由于时代改革的需要,所以会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因为他们在译者这个身份之前,首先是一名革命家、思想家,而翻译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他们传播革命思想的一种最直接有效的途径。第三步容纳,是在进攻的基础上,具体谈论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归化和异化。最后一步补偿,指通过一些手段将原文信息或者原文原本的风格风貌加以补偿,恢复平衡。容纳与补偿可看作是伽达默尔提出的第二次视域融合。译者在解读完成后,与目的语视域进行融合,形成译文。这四个步骤,斯坦纳认为是流动的,道德且平衡的^[11]。在这四步骤中,译者的主体性完全展现了出来。每一个步骤,译者都倾情参与其中,特别是在进攻和容纳部分。

例5 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呢?(《红楼梦》第二十四回)

杨宪益、戴乃迭译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

霍克斯译 I don't se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例5中译者从自己的角度进攻原文,获取了原文意义,接着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将原文意义融入译文。不同的译者会有自己倾向使用的翻译策略。

对于“米”的翻译,杨戴夫妇选择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特有的饮食文化风味。而霍克斯的译文,用“bread”替换了原文“rice”,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将这句中国谚语吸收同化至目标文化之中。

例6 “乌油头发”(《红楼梦》第五十六回)

杨宪益、戴乃迭译 glossy, black hair

霍克斯译 the lustrous, raven-black hair

对于袭人头发的描写,杨戴夫妇的译文将头发的颜色“乌”与光泽感“油”用两个形容词“black”“glossy”描写了出来。霍克斯在描述头发光泽感亮度时,选用了“lustrous”,而对于头发颜色的翻译,霍克斯与读者的文化相融合,用“raven-black”,用乌鸦的黑色羽毛补充说明了头发的黑色光泽。

例7 “俊眼修眉,顾盼神飞”(《红楼梦》第三回)

杨宪益、戴乃迭译 lovely dancing eyes

霍克斯译 Expressive eyes shot out glances that sparkled with animation

原文是对探春的外貌描写,运用汉语特有的四字结构,意象丰富,而在英文中并没有对等的形式,所以四字格的翻译很能体现出译者的能动创造性。杨戴夫妇运用简短的“dancing”这一动词将原文意义融入译文,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探春的机灵可爱;霍克斯则比较忠于原意,运用后置修饰词修饰探春灵动的双眼,补偿原文四字格中丰富的意义表达。

相较于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宏观描述,斯坦纳的阐释四步骤聚焦到了译者具体解读与选择翻译策略的微观层面,更具体地刻画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显现。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到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去观察世界,从不同的观察点看到的世界是各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在翻译中,同样的文本,在译者看来每次都是另一种样子。译者是从空间和时间上的一个点流过的人,也就是说,译者是有限的人,是当下时间空间下特性的总和,带有自己的独特视域。译者的主体性是无法忽视的,它会一直存在,并且以“此在”来阐释文本意义。所以,意义会一直处在流动、发展之中,而译者的不断阐释也会让作品不断迸发新的生命力,给读者带来新的思考。

三、结语

对于同一作品,不同译者总是会给出不同的译

文,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会对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在三位阐释学代表人物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译者作为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面纱被逐步揭开。阐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率先看到了译者解读文本的历史局限性,也看到了作为主体的译者在受制于历史性后做出的误读,但他并没有完全承认译者的主体作用,试图化解和消除误读。伽达默尔则通过视域融合的方法,帮助人们宏观描绘了译者解读文本时的思维活动方式,更加肯定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也允许“偏见”的存在。斯坦纳则更深入具体到了译者获取文本意义与衡量选择输出文字时的主体性过程,突出强调了译者在翻译中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 [1]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2]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3] 屠国元, 朱献珑.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2003, 24(6): 8-14.
- [4] SCHLEIERMACHER F. 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 And Other Writing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 王雪, 胡叶涵. 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5): 449-452.
- [6] 何卫平. 辩证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 1-14.
- [7] 柴楠, 袁洪庚. 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贡献[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1(5): 116-121.
- [8] 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M]. London: Sheed and Ward Ltd, 2004.
- [9] 宋蕾, 文军.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及其英译文本的选词理据互文性解读[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9, 30(2): 84-89.
- [10]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责编: 朱渭波)